

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知识形态的逻辑变迁： 古典型、现代型和后现代型

付昌玲

(山东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21世纪以来,国内文论界产生争鸣的一些前沿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均与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逻辑变迁密切相关。因此,学界亟须采用一种知识学反思视角,对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知识生产形态、范式转型、意义探寻进行考察和研究。受哲学、美学、语言学以及跨学科理论知识的影响,西方文学文本理论表现出古典型、现代型、后现代型三种知识形态。当代西方文论的范式转型也与20世纪西方文学文本观念的变革密切相关。文学意义取决于作者、文本、读者相互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本文诗学不失为一种充分发挥了对话思想的文学意义观。

[关键词] 文本理论;知识形态;古典型;现代型;后现代型;范式转型;文学意义;本文诗学

21世纪以来,国内文论界产生争鸣的一些前沿问题,如文学终结论、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边界和文化研究、文论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以及强制阐释论等,无一不与西方文学文本理论及其意义生成密切相关。或者说,这些争鸣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由于人们对西方文学文本理论发展的知识形态和内在逻辑缺乏一种反思意识。鉴此,学界必须正本清源,从人文学科的知识学高度,采取一种知识学反思视角,认真考察西方文学文本理论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的知识生产形态、范式转型、意义探寻等关键问题。如此一来,学界不但可以提升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学科化和专业化认知,而且有助于揭示国内诸多文论争鸣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而推动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健康和谐发展。

一、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知识生产形态

余虹曾提出文学理论的寄生性问题,认为“文学理论自身并无理论,它只是对形形色色理论的运用,是这些理论的影子”^{[1]201}。弗莱也曾指责一些批评理论“不是从文学内部去为批评寻找一种观念框架,而都是使批评隶属于文学以外的形形色色的框架上去”^{[2]8}。以此来批评新古典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存在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具有强烈外在社会倾向的文论尚且容易理解,但这是否意味着偏重文学内部的文本理论就可以豁免呢?答案是否定的。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知识生产同样具有强烈的寄生性,这主要表现在知识生产的动力学依据上:基于哲学或美学的文学理论知

[收稿日期] 2021-03-02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21-08-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BZW022)

[作者简介] 付昌玲(<https://orcid.org/0000-0002-4665-6086>),女,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文学及文论研究。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识生产、基于相关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和基于跨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3]204-205}。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知识生产由此表现出古典型、现代型和后现代型三种知识形态。

(一) 古典型:基于哲学或美学的文本理论生产

古典型的文本理论知识主要是通过寄生于哲学或美学的思想观念才得以生产出来。20世纪之前,相较于“形式”作为一种基本范畴在西方哲学或美学中的研究的兴盛,同样可视为“形式”的文学文本理论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并且,数量不多的成果也多是在形式美学影响下延伸或是嫁接到诗学诗艺中才得以生成的。根据西方形式美学的两个鼎盛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和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文学文本理论亦分成两股思潮。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形式”作为一种哲学或美学范畴已经生成,主要包括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形式、柏拉图的理式、亚里士多德的质料与形式。其中,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学文本的有机统一观,成为形式文论的滥觞。他规定了悲剧的起始、中段和结尾各居其所,但又相互协调,构成一个和谐的有机统一整体,并且这种由各部分组成的情节同样需要满足美的条件,美取决于体积和顺序。这种文本分析尽管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但形式主要模仿内容,具有工具论性质。

文学文本理论兴盛的另一个阶段源于18世纪康德美学的兴起,康德以“先验形式”为基础,提出了“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审美无利害性”观点,由此开启了审美和艺术自律居于主流的形式美学观,并影响了文学文本的形式理论。这在浪漫主义文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浪漫主义文论的主导倾向是重视文本与作者关系,似乎很难与文本形式产生关系,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密切联系:“说来自相矛盾的是,声称反对浪漫主义的现代批评一面拒不接受大部分浪漫诗和浪漫主义批评为诗歌而倡导的某些形而上学的主张,同时却又重新搬出浪漫主义批评的基本原理。”^{[4]6}例如,新批评派的“非个性化”观点是由艾略特提出的,原本是为了反驳浪漫主义强调的“诗歌是诗人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的观点,但实质上与浪漫主义的“消极感受力”观点非常相似,均强调了诗人不应在文本中放纵情感和个性。“像济慈和艾略特这样的诗人,强调诗人的‘消极能力’,对世界采取开放的态度,宁肯使自己具体的个性消泯,是客观性的。”^{[5]78}新批评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瑞恰慈认为作品意义来自文本对立调和的张力结构,而这种文本结构和意义实质上是由诗人通过发挥想象力赋予文本的:诗人可以通过其超人的组织经验的能力,有条理地把相互独立、相互冲突和相互排斥的冲动结合起来,使之处于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这一思想实际上吸收了柯勒律治的想象理论,因为柯勒律治也强调想象力可以促使作品对立调和结构的形成,而柯勒律治的想象理论是受到了康德和谢林想象力的影响。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浪漫主义文论尽管重视文本,但由于它们皆非源自文学内部的单纯形式追求,往往是依托哲学或美学的思想观念才得以生产出来,所以只能称为古典型文本理论。

(二) 现代型:基于语言学科的文本理论知识生产

现代型的文本理论知识生产同样是由文论的寄生性所决定,文学理论必须依托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才能实现自身的知识生产。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论转向”,从近代注重主客体关系的研究转向主体间的交流以及人的生活世界意义的研究。“人的生活世界是个意义的世界,意义需要理解,正是语言才使得意义的理解成为可能。因此,语言研究成为现代哲学的共同点。”^{[6]13}对文学理论而言,语言论转向直接开启了现代型文本理论的产生,“把美的来源,归诸作品本身,既不是来自象征主义的‘自然’,也不是黑格尔的‘理念’及康德的‘本体界’,从而把美学的发生学基础,牢牢地奠定在世俗的语言基础之上”^{[7]82}。

伊格尔顿曾言,“如果人们想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的时间,最好是定在

1917年”^[8]，因为在这一年，诞生了俄国形式主义。他们认识到传统的文学理论，无论是模仿论还是表现论，都忽视了文学特性的存在，只是把文学作为一种诠释哲学、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的历史文献。为了确定文学的独立地位，必须把文学视为一门与其他学科严格区分开来的系统科学，使诗学摆脱美学和哲学主观主义理论，重新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即形式技巧的道路上来。同时，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文学性，即文本的语言技巧、结构、布局、变形等内部规律，并通过陌生化，增加艺术感受的难度和浓度。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因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大部分学者都具有语言学家身份，所以他们极力促使文学研究和语言学联姻。

英美新批评派则鉴于19世纪印象主义批评过分描写个人审美经验而忽略艺术作品本身的缺陷，极力强调文学文本的自主性。艾略特提出“诗无个性说”，强调在诗的创作过程中，个人的感情、印象和经验通过特殊的个性工具发生相互融合，完全消融在诗歌文本中。瑞恰慈开创了语义学派，主张从语言学的分支语义学角度，对诗歌文本进行微观研究。燕卜苏则以古典文学作品为例证，说明文学中存在大量复义现象。兰色姆引入本体论这个哲学术语，用以说明文学具有特异性，文学研究应坚持作品的中心地位，而非作者或读者的主观心理倾向。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两人合著《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两书，彻底斩断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的联系，由此确定文本的中心地位。英美新批评派的立足点虽是语言学，但由于他们多非语言学科班出身，无法直接运用语音学、音位学、语义学等现代语言学概念分析文学作品，只能运用比喻、象征、反讽、语境等修辞学概念理论讨论文学问题。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尤为推崇索绪尔和雅各布逊的语言学理论。在他们看来，语言学及其相关概念不但可以阐明内在的语言学问题，还可以阐明文学、哲学、历史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问题。例如，托多罗夫认为诗学作为一门既抽象又内在的研究所有文学的学科，核心在于语言的自主性，重视研究叙事作品人物行为的语法对应关系。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人类学时，把神话、图腾制度、亲属关系、婚姻仪式、烹饪法等看成具有音位学一样的结构系统。虽然结构主义文论同样强调文学研究的语言性，但关注的重点是作品的内在结构，通过揭示作品结构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发现共同的叙事规律和普遍有效的作品模式，本质上是自我封闭的文本中心主义。保罗·利科作为后结构主义的解释学家，在吸收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将语言作为结构与事件之间的中介物，认为语言既是一种结构，又与行为和事件等相关，从而实现了语义。因而，在利科这里，语言不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是一种处于对话之中的交流行为，他通过对句子特殊结构的语义学分析，达成了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也在此基础上创新了解释学的语言观。

（三）后现代型：基于跨学科的文本理论知识生产

跨学科的文本理论知识生产是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它强调突破学科界限，不再囿于单一学科的知识，把文学当成一种话语或文化进行研究。

作为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论的典型代表，互文性文本最早由法国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概念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这是她把解构主义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融合的结果。艾伦(Graham Allen)把互文性文本的具体呈现方式概括为四种：符号语义复杂多样；符号与各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关系；文本和文学系统的关系；文本和另一个文本之间的转换关系^[9]⁸⁹。巴特认为：“每个文本都依存于互文状态，互文本身存在于一文本和另一文本之间，它不应与文本的某种本源相混淆：试图找到一个作品的‘来源’。‘影响物’也就落入了起源关系(filiation)之神话的窠臼；构成文本的引文是匿名的、无从查考的，而且也是已被阅读过的，它们是不加引号的引文。”^[10]³⁴⁰由此可见，互文性文本强调任何文本都是若干文本交汇融合的结果，是在对其他文本重读、改编、整合的基础上彰显自身

价值的。

泛文本则认为社会历史皆以文本形式存在,皆可以从语言结构入手分析其背后蕴含的种族、性别、身份等文化政治倾向。例如,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文本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文本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文本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11]19}新马克思主义也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堆作品、文本,时髦、服装也是一种文本,人体和人体行动也是文本……新式的社会科学认为社会是一种文本,因为社会包含了一系列的行为,这些行为就像是一些语言。”^{[12]204}泛文本虽然为文学研究注入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系统,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多维性,但也带来了文学研究的泛化倾向,文学特性逐渐消匿于文化研究的学科杂糅和理论膨胀中,有丧失文学边界之危。

由此可见,从前现代的古典型文本理论,到现代本体论的文本理论,再到后现代互文性的文本理论,直至文化研究的泛文本观念的兴起,促使西方文学文本观念横向展开,构成了西方文学文本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但这种发展逻辑很快便因多模态文学,尤其是超文本的出现而被打破,导致文本观的线性发展发生断裂。多模态研究是“一种具有跨学科影响的研究形态,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强调多重符号化方式在社会互动中的交织和符号物态、符号运用者感官经验在意义生成中的重要性”^{[13]110}。借助此关键词,传统文学研究中被长期忽视的物质性、感官性维度受到关注,表演文学、多模态印刷文学、数字文学、作品集群等新文学样态获得较为集中的审视,使不断扩容的文学现象得到理论阐释。但由于其对超文本的重视,传统文本形式遇到挑战。“超文本”(hypertext)由泰得·纳尔逊于1965年提出,突出特征就是以电子媒介为载体,“超文本这个概念表示非顺序的书写文本,它给予读者各种分叉选择,并允许读者作出种种选择,最好在一个互动的屏幕上阅读。就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它是一个通过链接而关联起来的系列文本块体,那些链接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路径”^{[14]19}。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本载体形式,超文本打破了传统文学文本的存在方式。“如果说语言论文论关注的是以语言艺术为中心的文学,那么,在电子媒介的入侵之下,文艺领域发生了扩容,语言文学不再是艺术的主导类型,而由电子媒介主导的影视艺术、多媒体的网络艺术成为艺术门类的核心。”^{[15]47}就是说,曾经以语言文本为主导的文学作品,逐渐被超文本的跨媒介性、图像性取代。这样也就否定了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和语言学存在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终结。

二、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范式转型

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库恩提出“范式”概念:一个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即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一群科学研究成员因为具有相同的价值信仰、概念体系和实践准则,可以有效地研究和解决当前乃至后续问题。但范式并非静态不变:当一种先前主导的旧范式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时,便会出现一种乃至几种新范式与之竞争,最终某种新范式获胜,取得主导地位,产生一种新的知识形态。以此分析,不难发现20世纪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知识形态变迁,实际上就是一个理论范式更替的过程:从现代范式到后现代范式、从理论范式到后理论范式。

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现代范式的确立表现为一种从主观到客观的过程。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论时期,文学研究的重点不在作品而在作家,作家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作品是作家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但到了20世纪初,源于现代启蒙理性的学科自觉和职能分工,人文社科领域普遍对宏观理论建构产生了兴趣。尤其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成果成为各学科争相汲取并建构自身科学性的重要资源。文学研究也开始摆脱之前的模仿论和表现论,从强调外在世界和作家传记转向追求作品的文学性和文本的自足性、客观性,以形成自身鲜明的文学理论,这就是西方文学文本的现代范式。

这种追求客观性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宏观理论范式建构的过程。伊瑟尔说：“理论变得不可或缺，这一情况出现在文学研究的关键时刻。……很明显，那些历史悠久的艺术批评方法已经无法应对现代性，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理论的兴起标志着批评历史的转变。”^{[16]3-4}德曼也说：“只有当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再基于非语言学的方法，即历史的和美学的方法时，或更精确地说，只有当讨论的对象不再是意义或价值，而是在意义与价值确立之前的生产和接受方式时（这暗示着这个‘确立’是有问题的，以至于必须要有一个自主的批判性研究学科来考察它的可能性和地位），才会形成文学理论。”^{[17]7-8}所以说，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启了现代范式的文学理论建构过程。

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文学文本理论又发生了后现代范式转变，表现为一种从作品到文本的过程。在通常意义上，作品与文本这两个术语经常混用，很少区分。但后结构主义为了突破现代文论所固守的文学性和意义单一的弊端，赋予文本全新的含义。巴特认为，作品和文本分别代表了文论的现代范式和后现代范式。作品是基于文学性和语言结构的物质性存在，而文本存在于言说活动和生产活动中，表现出无限的生产性潜能。作品归于所指，意在探寻某种神秘的、终极的东西；文本归于能指，依循的是一系列断裂、重叠、变动的文学活动，文本虽然如语言一样是被结构起来的，却是开放、无终结、去中心化的。作品要素与世界、作者、读者隔绝，文本则由作品转向读者，强调了读者的生产性、可写性和意义无限可能性。由此可见，作品适用于现代文论范式，文本适用于后现代文论范式。

从文本理论的现代范式到后现代范式，固然与解构主义思潮有关，但文学文本理论所强调的语言学成果同时也被哲学、历史、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汲取，又反过来推动了原先固守的纯粹文本观与社会政治权力结缘，走向互文本及泛文本。克里斯蒂娃曾说过：“语言学恰巧是所有研究人类实践的学科里第一个作为精密科学建设起来的学科，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它最大限度地限定了自己选择的研究对象。所以，人文科学只需把语言学的方法移植到其他领域就行了。作为起步，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领域都当作语言看待……思想再次透过语言的全景镜头，捕捉着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18]317-318}作为语言的文学也天经地义地在后现代社会充当起其他学科掌门人的角色。大卫·辛普森便认为，文学对其他学科具有一种元叙事的功能，文学的隐喻、反讽、转喻等种种话语模式，以及文学的情节逻辑，也都是历史语言的模仿范本^①。德里达从文学语言的隐喻理论得到启发，认为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弊端在于遮蔽了哲学文本的隐喻性，以精确的概念语言统摄世界，造成了主客体形而上的二元对立。而隐喻作为人类的原初语言，形象性先于规则性存在，被视为原义表达的东西是一种隐喻，而在经验中或语言中不存在先于隐喻的东西。文学则因其语言的隐喻性、变动不居的意义，具有逃逸概念逻辑世界的可能性。因此，德里达认为，哲学与文学都是隐喻文本，隐喻在哲学话语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超想象，就具有隐喻性这一点而言，哲学语言与普通语言并无二致。这样就不仅破除了哲学与文学的对立，而且摆脱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束缚。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修撰和编写就是文学的仿制品，是一个虚构想象的世界，具有与文学一样的话语叙事模式。他以西方现代文本理论为基础，认为历史上的一系列事件要成为故事，首先需要情节编排，并逐渐展开成为特殊的故事种类，即弗莱《批评的剖析》中的四种故事形式：浪漫传奇、悲剧、喜剧和反讽。海登·怀特还从传统诗学和语言学中找到了历史学家解释历史事件时惯用的概念策略，即转义理论：隐喻、换喻、提喻和反讽。诸如此类文学文本及其语言学成果被后现代各种人文科学所汲取的例子不胜枚举。也正如此，才促使纯粹文本语言重新与社会文化、政治结缘，成为一种话语，从而“完成了对文学的扩容，形成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整合，借助语言在更高层

① 转引自朱立元、张蕴贤《新审美主义初探：透视后理论时代西方文论的一个面相》，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第119页。

面上实现了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对人文科学的嫁接与渗透,即一种包容了语言、想象、诗性、叙事、修辞与行为的大‘文学’观念对文学、历史、哲学等的全覆盖”^{[19]34}。也可以说,正是这种文学文本从语言转向话语研究,奠定了西方文学文本和文学理论后现代范式建立的基础。

正因如此,20世纪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范式变革不仅推动了文学研究从印象式和经验式批评到作为一种理论建构的生成,也促使了文学理论现代范式和后现代范式的更替。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宏大理论建构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蜜月期、黄金期逐渐趋于终结。伊格尔顿直言现在进入一个理论之后的阶段,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已经消失。拉曼·塞尔登等人也指出:“这一时期(大约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我们可以称为‘理论时期’(Theorsday),或者如更多人认可的那样,‘理论转向时期’(the Moment of Theory),一个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物质主义政治的副产物共终结的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一个现在看来已被所谓‘后理论’(post-Theory)取代的时期。”^{[20]3}当然,诸多宣称理论终结的声音并非哗众取宠,主要原因在于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实践,追求宏大叙事的理论显露出疲软无力之势,所以不得不转向与人们日常生活更为接近的大众文化批评与实践。进一步言之,理论之后是一种研究的转向,是“从以解构为主的大写的理论分化出在研究对象和关注范围方面更加具体的众多小理论(theories),比如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身份研究、文化研究等”^{[21]82},理论之后实际上依旧属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只不过是较晚近的阶段。

具体到文学理论上,人们曾大力批判理论范式下的文学研究,原因在于理论导致了文本审美特性的遗失。布鲁姆便认为高大上的理论纠缠于经济基础、权力话语等,试图从文学以外的东西里寻找文学本质,因此,把消解文学经典的理论称为“憎恨学派”。拉曼·塞尔登认为文学理论研究逐渐偏离了文学文本,尤其是意识形态、政治理论逐渐侵蚀了文学性。约翰·约京和西蒙·马尔帕斯认为,文化研究的盛行导致文学理论远离文学和审美。乔纳森·卡勒更是讽刺地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常被人称为高大上的理论,就其学科而言,都并非真正的文学理论,因为它们根本都不探讨文学作品的区别性特征及方法论原则。瓦伦汀·卡宁汉也认为,理论阐释固然激活了文学文本,但同样也肢解了文学文本。正因如此,一部分学者才会重新审视和反思文学理论,希望采取一种恰当的方式,避免文学理论对文本的肢解,使文学和审美重新回归到文本自身的欣赏和理解,回归到独特的文学诗性。例如,瓦伦汀·卡宁汉就主张读者抛弃理论,坚持古老的阅读习惯,从身体开始,用手指触摸文本页面上的文字,并沿着文字移动,将之变成嘴里读出来的文字。这种阅读始于身体的亲密接触,而身体的亲密接触又转化为与文本中的心理和情感的亲密接触,阅读的结果是一个复杂的深深根植于理性却又特别依赖情感的伦理教育场景^{[22]147}。曾引起中国“文学终结论”之争的希利斯·米勒也在2000年后认为,虽然以印刷技术为背景的狭义文学面临终结命运,但广义的文学性将以各种形式永恒存在;并且宣称,尽管现代很多人认为文学文本的细读传统已经过时,但依旧需要坚持,这是一种没有回旋余地的顽固的、倔强的坚持,对大学里的文学研究相当重要。乔纳森·卡勒为了强调文学文本的重要性,也对文学性做了五点阐述:文学是语言的“突出”,文学是语言的综合,文学是虚构,文学是审美对象,文学是互文(本)性。

当然,这些观点主张抛弃理论范式、重新追求文学性的文本阅读,并非主张再回到结构主义和新批评所鼓吹的那种故步自封的文本阅读,而是注重在文本分析中引入历史语境,与文化、政治、历史互相阐释。为了确证这种范式的合理性,乔纳森·卡勒辩护称:“形式主义这个词在历史主义的时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贬义的名词,但形式主义并不像时常被误解的那样包含着对历史的否认。事实上,他们否认的是将作品作为症候的历史进行阐释。”^{[23]9}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文化研究只是把文学文本作为一种文化个案的反拨,非常符合后理论范式所主张的解决具体问题的微观理论策略。伊格尔顿也认为,理论之后的文学研究既不能重走新批评过分注重语言特性的老路,也不能滑向解

构主义否认文本自主性的深渊,而是应该回到理论之前,在关注文本虚构性的同时,也认为文学作品是文类、语言、意识形态、无意识欲望等共同作用生成的,并按照自己的内部逻辑发展进化。这实际上是伊格尔顿通过借鉴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新审视文学研究的结果,文学语言具有特殊性,能够以言行“事”,即文学虚构在用文字描述世界时就已经完成了某种行为。美国当代批评家莫瑞·克里格也批评了将文学文本与历史主义相隔离的弊端:“文学文本由语言构成,一种语言怎么可能在不被历史文化环绕的时候发生作用呢?同样,一个评论家又怎么可能完全不将作品作为文本解读,而只是专注在历史方面呢?”^{[24]37}所以,他提倡一种能够将文本的审美阅读与历史语境结合的“语境主义”研究,并且抛弃了新批评所主张的那种孤立分析文本客体的狭义形式主义,提倡一种广义的形式主义,从而拓展形式的内涵:“首先是诗人心灵所窥见、把握并且投射(人们希望如此)的想象形式;其次是在读者经验过程中,所窥见、把握并且投射的,既是历时性又是共时性的言语形式;最后是作为文化为社会把握自身意识所创造的形态之一的形式。”^{[25]56}由此可见,在文学研究的理论之后,对文学文本的强调并未消失不见,反而依旧唱主角,只不过更突出地强调了语用学,关注文本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使用,“关注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学作品的塑形,关注文学形式的社会历史意蕴,关注形式在阅读过程中的实现方式,从而构建一种‘新修辞学’”^{[26]176}。从上述文本理论的变革分析中可以看到,尽管各种范式之间充满批判和否定,但文本理论始终伴随其中,推动了文学理论诸种范式的形成和转换。

三、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意义探寻

针对20世纪文学文本的意义研究状况,美国著名文论家奥尔森曾这样描述:“过去半个世纪文学理论的一个主要进展就是意义范畴在理论上引人注目的上升。意义范畴不仅被作为手段应用于文学的语词和语句的分析,还被应用于分析文学作品。”^①这说明了文学意义也应该是文学文本理论考察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意义及文学意义的研究并非凭空兴起,而是与20世纪解释学和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遍及哲学、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对文学意义而言,在不同阶段的具体所指是不同的,这主要源于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知识形态差异和范式转变。

在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的古典阶段,文学意义由作者决定和生产,“文学意义被视为作者意欲表现的东西在作品中的体现,即作者的思想意图通过词物相称的客体化内容在文学中沉积为意义实体。作者的思想意图投注与作品的意义生成被认为是一致的和吻合的”^{[27]140}。在西方文本理论的现代阶段,文学意义主要由文本语言生成。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的意义源于文学的语言形式,形式与内容完美交融在一起。英美新批评则把诗歌的张力视为文学意义的源泉,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的有机整体。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固然摆脱了局部的语言分析,重视整体结构,但也完全把作品意义归结于文本的语言结构系统。

对于现代范式下的文学意义由文本产生的观点,乔纳森·卡勒提出了批评:“语言学的分析并不能提供一种方法,使文本的意义从它各个组成成分的意义中归纳出来。因为作者和读者注入文本的远不止单一的语言学知识,而外加的补充经验——对文学结构形成的期待,文学结构的内在模式,形成并验证关于文学作品的假设的实践——正是引导读者领悟和架构有关格局的因素。”^{[28]148-149}正因如此,后现代范式下的西方文本理论则从文本转向读者,凸显出了读者对文学意义的作用。伽达默尔认为,读者的阅读理解是实现文本意义的关键,如果没有读者参与,文本意义不仅无法得到理解,而且将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英伽登把文学作品视为一种虚构的“意向性客体”,存在大量不确定的空白点,只有通过读者的想象式阅读才能使之具体化,文本意义也才能彰显出

① 转引自赵亚珉《试论文学意义的多层次存在》,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第47页。

来。保罗·利科的文本意义生成观也是建立在读者接受的基础上,他认为:“我们从历史学家那里期待某种主观性,不是一种任意的 subjective 性,而是一种正好适合历史客观性的 subjective 性,因此,问题在于一种隐含的 subjective 性。”^{[29]4}这种隐含的 subjective 性已经和伊瑟尔提出的“隐含的读者”概念有相通之处了,伊瑟尔认为文本意义的逐步现实化是读者在各种可能性中进行个性加工和选择的结果。泛文本研究同样重视读者的阐释功能,只不过更加强调社会意识形态对文本的制约作用。

但需要看到,无论是强调文本意义由语言或其深层结构生成,还是由读者理解或阐释决定,均把作者对意义的创造功能排除在外,这无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并且,造成了西方文论发展中一个极为常见的弊端:强制阐释。所谓强制阐释,是由张江先生针对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的弊端提出的一个批评概念,具体是指在研究和阐释文本意义时,“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30]5},基本特征包括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和混乱的认识途径。以此对照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由文本语言赋予意义和读者阐释意义的思想,就会发现强制阐释的弊端存在。例如,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文论过度倚重语言学知识,甚至上升到自然科学高度,对文本语言进行完全封闭固化的抽丝剥茧式分析,这实际上造成了强制阐释的场外征用弊端,忽视了文本语言的诗性和情感性特征。以文化研究为特色的文本阐释往往会观念先行,造成主观预设的弊端,即论者的主观意向先行,通过前置的明确立场,对文本意义和价值强制裁定。

因此,为了避免文学意义阐释过程中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和强制阐释弊端,有必要建立一种作者、文本、读者三者相互对话的文学意义观。马丁·布伯确定的“你—我”人类平等交流关系模式、胡塞尔的交互主体现象学,均为对话文学意义观提供了哲学基础,巴赫金的对话诗学则为此提供了实践范例。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人生存的根本:“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31]340}文学意义也产生于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的交流对话:“话语是一个两面性的行为。……它作为一个话语,正是说话者与听话者相互关系的产物。任何话语都是在对‘他人’的关系中来表现一个意义的。”^{[32]436}“任何一种理解都是对话的。……意义不在词语之中,不在说话者的心中,也不在听话者的心中。意义是说话者与听话者凭借该语音综合体,相互作用的结果。”^{[32]456}据此对话思想,巴赫金通过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文本,提炼出了对话主义的复调诗学理论,认为文学意义不是作家的独断专行,而是“多声部的合唱”。并且,巴赫金在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诗学理论的过程中,也完美体现了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的对话关系。

那么,具体到当代文学文本理论和批评实践中,如何建立一种能够促使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互相对话的文学意义观呢?在这方面,“本文诗学”^①不失为一种充分发挥了对话思想的文学意义观。本文诗学是由胡友峰教授针对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理性诗学弊端而提出的一种纠偏策略。理性诗学是指在“对大量文学文本综合分析基础上从理论的高度和宏观的视野去阐释文学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一门学科,它是纯粹理性化的文学理论的称谓”,它注重以逻辑思辨的法则对文学现象进行抽象演绎,具有独立的话语系统、逻辑构成方式和价值体系^{[33]125}。理性诗学固然可以从学理上为文学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并且可以确立文学学科的自身独立性,但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形而上的理性诗学不仅导致文本的诗性丧失,而且相对忽略了批评者和作者个人对本文诗学的理解和认知。因此,有必要回到一种原初的形而下诗学,即本文诗学。这种诗学形态既可以从作者方面理解,即作者通过“文学本文”的构建,将自己的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隐含表达在文本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艺

① 文本是全称,本文特指某个本文。文本和本文是全称和特称的关系,即 text 和 this text 的关系。

术形象和思想;也可以从批评者方面理解,即批评者通过文学本文解读作者的艺术手法,并重构作者的诗学。本文诗学就是要求理论研究从文学本文出发,在文学本文中寻找诗学自由思想的可能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文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这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从本文到理论”。本文诗学作为一种原初的诗学形态,早已存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中国刘勰的《文心雕龙》均先是由荷马或先秦两汉文人将自己的诗学思想融入文本中,亚里士多德和刘勰对之进行解读和重构,从而得以成就文艺理论的典范。虽然胡友峰教授阐释本文诗学的系列文章并未明确从文学意义的理论角度予以阐释和建构,但深入细究便会发现,本文诗学理论实则蕴含了对话思想的文学意义观。从作者赋意方面看,本文诗学强调了作者在创作时有意抑或无意地把个人的思想观念和诗学思想隐含在文学文本中,期待读者和批评者的再发现。从读者释意方面看,批评者或欣赏者通过仔细阅读研究“本文”,在解读作者思想和艺术手法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体验、想象和诗学意图,对文学意义做出重新阐释,实现作者读者互通。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作者赋意,还是读者释意,依据的都是文学文本。文本是外在形式特征与内在生命的统一,作者的思想观念、生命体验最终都要通过文本的文体、语言、情节进行表达。而读者释意也必须从文本出发,“在具体的文本阐释中既要立足文本,但又要超越文本,提升文本,在文本中发现作家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思想意义和理论主题,从而在本文中发现本文所蕴含的思想主题、提升本文的思想内涵”^{[33][122]}。

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足于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互动互通的文学意义思想便建构而成。并且,由于其立足点在文本,是从文本到理论的文学意义建构方式,这就可以有效避免从理论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的强制阐释弊端,从而开启文学意义的多元性、对话性、交流性。

[参 考 文 献]

- [1] 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第201-203页。
- [2] [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吴持哲校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 [3] 邢建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动力学根据》,《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204-213页。
- [4]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2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 [5]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 [6] 李朝东:《言论转向与哲学解释学》,《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13-17页。
- [7] 张冰:《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 [8] [英]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 [9] 童明:《互文性》,《外国文学》2015年第3期,第86-102页。
- [10] [法]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杨庭曦译,《外国美学》2012年第1期,第347-353页。
- [11]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12]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13] 张昊臣:《多模态》,《外国文学》2020年第3期,第110-122页。
- [14] 周宪:《论作品与(超)文本》,《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第12-24页。
- [15] 胡友峰:《论电子媒介时代文论话语转型》,《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第46-55页。
- [16] [德]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 [17] de Man P.,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 [18] [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马新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 [19] 汪正龙:《语言转向与文学研究》,《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31-35页。

- [20] [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德·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21] 陈后亮:《理论会终结吗?——近30年来理论危机话语回顾与展望》,《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第80-89页。
- [22] Cunningham V., *Reading after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Press, 2002.
- [23] Culler J., *The Literary in The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4] Krieger M., *The Institution of The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5] [美]莫瑞·克里格:《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李自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26] 马大康、王正中:《“理论”“后理论”的症结及其疗救——对西方理论话语的批判》,《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第173-183页。
- [27] 汪正龙:《论20世纪文学意义观念的转变》,《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第140-144页。
- [28] [美]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 [29] [法]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 [30]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第5-18页。
- [31] [苏联]米哈伊尔·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32] [苏联]米哈伊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33] 胡友峰:《“本文诗学”论》,《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第120-126页。

Logical Changes of the Knowledge Form of Western Literary Text Theory: Classical, Modern and Post-modern Text Theories

Fu Changl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some of the frontier issues in the domestic literary theory, such as the prediction of the end of literature,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daily life, the boundar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ssentialism and constructionism of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compulsory interpretation theory, etc. have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gical changes of Western literary text theories to some extent. The emergence of disputes is due to the lack of a scientific consciousness of reflection on the knowledge form and intern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literary text theorie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of adopting a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ical reflection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the knowledge form,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and meaning of literary text of Western literary text theories.

Influenced by philosophical aesthetics, linguist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knowledge, Western literary text theories show three types of knowledge: classical text theory, modern text theory and post-modern text theory. The knowledge of classical text theory was produced mainly through the parasitic ideas of philosophy or aesthetics.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form”, as a philosophical aesthetic category, had already come into being, mainly including Pythagoras’s mathematical form, Plato’s absolutist form and Aristotle’s matter and form. Among them, Aristotle put forward the organic unified view of literary text on this basis, which became the origin of formal literary theory. In the 18th Century, on the basis of “transcendental form”, Kant put forward the views of “purposeless purpose” and “aestheticism without interest”, which initiated the formal aesthetic view with aesthetic and artistic self-discipline as the mainstream, and influenced the formal theory of literary texts. This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romantic literary theories. The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exts, but because they are not

derived from the pure pursuit of form within literature and are often produced by relying on philosophical or aesthetic ideas, they can only be called the classical text theory.

The production of the knowledge of modern text theory is also determined by the parasitism of literary theory, which can only realize its own theoreti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by relying on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related disciplin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 “linguistic turn” occurred in Western philosophy, which shifted from the modern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to the study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ubjects and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s far as literary theory is concerned, the linguistic turn directly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text theory.

The production of the knowledge of post-modern text theory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dimension, which has emerged since the 1960s with the rise of post-structuralism and deconstructionism. It emphasizes a breakthrough of the boundaries of disciplines, i. e. to study literature as a kind of discourse or culture, no longer being confined to the knowledge of a single discipline. Intertextuality and pan-text are its important contents. Intertextuality emphasizes that any text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gration of several texts, which highlights its own value by re-reading, adapting and integrating other texts. Pan-text holds the view that all social history exists in the form of text, so the underlying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such as race, gender and identity can b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structure. The meaning of literary text depends on the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author, the text and the reader, and the textual poetics, which gives full play to the thought of dialogue, shows a good viewpoint on meaning of literary text.

To sum up, by adopting a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ical reflection, this paper elevates the Western literary text theories to the level of epistemology of the humanities, and carefully examines the key issues presented in different stages, such as the form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adigms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Therefore,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clarifying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domestic disputes and avoiding the verbal arguments beyond theoretical analysis. What's more, it is a kind of important guidance for searching and sorting out the textual thoughts of Chinese classical and modern literary theories, as well as realizing the breakthrough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textual theories under current interference of hypertext.

Key words: text theory; knowledge form; classical; modern; post-modern;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meaning of literary text; textual poetics

